

在文化转折的 十字路口

世纪初的中国文化选择

20

苏桂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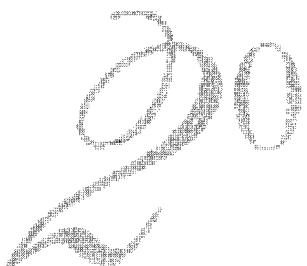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在文化转折的 十字路口

世纪初的中国文化选择

苏桂宁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在文化转折的十字路口：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选择
/ 苏桂宁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360-6178-1

I. ①在… II. ①苏…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20世纪 IV. ①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4288号

责任编辑：揭莉琳

技术编辑：易 平

装帧设计：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14.1 2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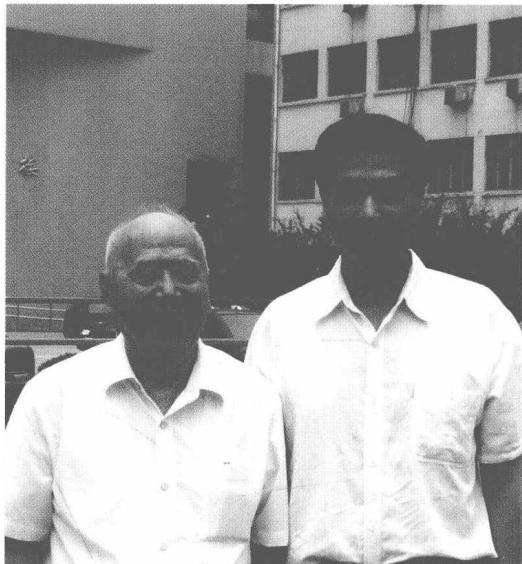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n.com.cn>

本书获暨南大学“**211工程**”第三期
“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与钱谷融先生合影

为学之道，首
在求真，在真的
基础上，还须
求深、求新。5
精掌棋艺处。
钱谷融

2010年10月1日

钱谷融先生题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 现实批判中的文化选择 3

社会变化中的文化心态 3

从道德反思到政治批判 11

第二章 | 文化改良与变革 17

康有为的文化改良思想 20

梁启超的文化变革与文化重建 30

第三章 | 西学东渐中的观念选择 41

中体西用，中国式的文化选择标准 41

平等自由观念与民智启蒙 44

民主与科学的选择 49

第四章 | 文化机制的变革 59

科举的废除与现代教育的兴起 60

文化传播机制的变革与公共空间的扩张 69

第五章 | 文化选择的桥梁 74

严复，进化、变法与自由	74
林译小说与林纾的文化选择	82
第六章 革命，一种文化主流的滥觞 96	
排满与民族革命	96
章太炎的民族革命论	104
无政府主义，从革命到虚无	109
第七章 本土文化的重建 117	
国粹思潮与本土文化的重建	117
孔教，国教，传统文化支柱的树立	123
第八章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129	
《新青年》与陈独秀的道德重建	130
“汉字革命”与钱玄同的文化革命	136
人口素质及其文化	147
第九章 现代思想视野的拓展 151	
蔡元培的美育选择	151
王国维，从国学到西学	156
胡适的文化立场	162
胡适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	178
第十章 鲁迅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选择 188	
文化失据的焦虑	188
痛苦的灵魂	203
文化自卑与文化批判	215
孤独的反抗	227
呐喊者的希望	239

第十一章 新旧文化之争与文化建设的尝试	251
《学衡》的文化立场	251
全盘西化与陈序经的文化批判	263
后记	277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变化有很大的差别，它是两种价值反差极大的文化相互较量与交融的形态。中国本土文化遭受了主要来自西方和东方强国的异质文化的冲击，两种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文化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震荡，它直接地影响到中国人的生存利益，对中国人数千年形成的文化生存依据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甚至不断地瓦解着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基础，使得这一庞大的社会群落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

这个在政治上闭关锁国，经济上自给自足，文化上自成体系的专制王国，统治者所想象的世界格局是中国至上，四海臣服，然而，在短短的数十年里，列强的炮火无情地摧毁了这个泱泱大国的领土防线，更无情地摧毁了这个傲慢王国的精神防线。

20世纪初是中国思想文化变化的关键时期，它奠定了20世纪的思想基础，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进程。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在一种怎么样的环境下以什么心态和标准选择这些知识，并由此而建立起相关的知识权力。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纷乱的局面下，各种各样的思想思潮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呈现出纷繁的色彩，本书不是面面俱到的把所有的问题都进行阐述，而是选取相关的知识点，以阅读思考的方式进行考察，主要做法是：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杂志以及思想思潮，考察其文化立场、应对态度和实践，通过对这些知识点的考察，对当时的文化批判和选择

建设的动机和条件进一步地认识，尤其对相关的文化权力的建构方式有更多的探讨。这其中，也许带有更多的个人感受的主观性，但是，在面对这些历史思想文化的碎片时，以自己的方式将它整合起来，也不失为一种呈现意义的做法。

对 20 世纪初的知识选择，首先要提出的是，这一代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知识系统进行置换，什么因素导致了近代文化的大选择？他们在这次文化变化中选择了什么？他们是如何进行选择？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进行选择？另外，它们的这种选择在当时和以后对中国文化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如何？其有效性达到什么程度？

20 世纪初期的文化选择，基本上是按照两条路径进行，一条是从西方输入的各种文化思想中寻找中国所需要的资源；另一条就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重新挖掘国粹，使之成为重新整合民族精神的粘合剂。这两条路径不时地发生争论和冲突，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兼收并容，并在矛盾中走过了 20 世纪。

20 世纪已经过去，但是，20 世纪初中国文化在建构过程中所打下的基础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尽管今天的社会环境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的文化网络也已经形成，但是，批判与选择仍然成为当代文化建构的重要的方式，而且它对民族文化的建设仍然是重要的。

第一章 现实批判中的文化选择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其转变的特征是宗法式的专制社会走上了末路，异质文化的冲击加速了它的灭亡；同时，固有的文化价值受到挑战和瓦解，中国人上千年所依赖的文化生存依据发生了危机。在数十年中，中国人的社会心态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作为一种孤立的文化，它从盲目地自大转向了挨打的自卑，从现实的痛苦走向了生存的焦虑。

社会变化中的文化心态

1840 年以后，中国国民的心态转变是张弛并进的，列强对中国的几次重要的军事打击是国民心态变化的重要转折点。第一次鸦片战争，把一个封闭无知，盲目自大的大国打开了一个难以弥补的缺口，从此，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精神发生了动摇，天朝的神圣光环被列强的炮火硝烟染上了滑稽的色彩，自傲自大，痛苦无奈，无知自卑的心态交织着笼罩了国民的精神，天朝的臣民在一段时间陷入了茫然失措、惶惑不安的状态。

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态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得相当充分，战争胜利，其结果却是失败的，这个虽胜犹败的结果反映了王朝信心的失落。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无论在军事、经济、政治上还是在精神上对中国人的打击都是十分巨大的。它给了大清王朝致命的杀伤，是导致清政府统治崩溃的致命原因。这场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海军惨淡经营的军事支柱——北洋舰队，在朝鲜战场和辽东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一系列惨败，更加使得国家生存信心丧失。这个结果反映在《马关条约》上，就是确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以及附属岛屿；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分八次在七年内交清，连利息在内。这个数目超过清政府每年国库收入的三倍。领土已经无法自保，经济也损失严重，更难以接受的是，原来在文化上师承中国的东亚小国日本竟成了打败堂堂中国强劲对手。这对国人的刺激是很大的，这一事实，严酷的考验了大清国民的生存信心。

对国家存亡的忧虑已经成为19世纪末的主要情绪，正如康有为所概括的：“今天下所忧患者，曰兵则水陆不练，财则公私匮竭，官不择材，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下皆无学。”^①这种焦虑的心态由于生存利益受到威胁而更加严重。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清政府在国民中的威信彻底地崩溃。传统王权的神圣光环在中西文化竞争中崩溃了。尽管立宪保皇的呼声还在风行，但是，相当多的人已经失去了保皇的信心，人们普遍的怀疑保皇的意义。《辛丑条约》签订前宣扬革命，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是，在条约签订后谈革命，阻力就没有那么大了。许多人从保皇转向了革命，甚至认为，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国民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也对专制王权的支撑力失去了信心。从变法到革命，社会心态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宣传者的鼓动之外，直接地生存利益是触发人心变化的根本原因。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页。

1896年8月9日，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问世，便以其犀利的指陈时局的笔触博得了社会的叫好。他言人所欲言，道出了朝野要求变法革新的强烈愿望。《时务报》“张目大骂，如人人总欲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争传诵之。”^①这样的心态，显示了变革的不可逆转。1903年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的问世，邹容的《革命军》的出版，反映了社会形势和社会心态已经有了质的变化。这些带有激烈的革命倾向的书籍能够广为流传，足以见到社会心态已经从鼓吹变法改良时期的对清政府的模糊希望转入了对专制王权的彻底地失望。社会革命成为必然的趋势。有学者认为，如果这个时期不发生革命，中国近代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但是，历史不能假设，社会走向革命，似乎也是一种必然，只有从中找到其必然的原因。

社会进化论在这个时期成为重要的思潮，它与这个民族的生存危机直接相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严复、陈天华、邹容的进化论的思想描述了世界发展史和中国发展史。如果不走富国强兵之路，就会灭族灭种，就会像印度“广土不保”；像安南（越南），“中兴无望”；像波兰，“飘零异乡”；像犹太，“没有家乡”；像非洲，“永为牛马”；像南洋，“服事犬马”。^②这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正是当时触动人们迫切变革主要动因。这是一种来自外界的压力，对于一个已经具有惰性的民族来说，其压力不可谓不大。

国民心态的变化，同样表现在对自身生存的文化依据的重新审视上。中西文化之争，中体西用的提出，便是在东西方文化的较量中，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必然导致的怀疑和争论。对于“中体”的认识和强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动机和复杂的心态，既有文化守成者担心自身文化的丧失而力保之，也有希望接受西方文化，以及在把握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程度时所产生的矛盾心理。然而，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全面进入，并且日益显出优势，人们对“西用”的兴趣远远胜于对“中体”的兴趣，最后甚至发展到“中学”无用，全盘西化的程度，而且，这个时候的文

^① 《戊戌履霜录》卷二。

^② 陈天华：《猛回头》。

化输入，已经不是早期以坚船利炮的强行输入，而是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地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的价值标准作为评估中国文化的标准，甚至把西方的社会模式作为中国发展的理想模式。前后几十年，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变化如此巨大，可以看到以生存救亡为核心的动力是何等的巨大。

在这变化的几十年中，还能够使国民维持信心得以与西方相抗衡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优势的认同。文化的守成者固然是倾尽全力来证明这一点，即使是那些较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比较谨慎的持保留的态度。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主要是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西方，之后的洋务运动，也还主要是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的实践。不过，由这一实践而导致的对精神文化的反省，也是必然存在的。洋务运动的过程和结果，是中国人从器物认识转向精神认识的一个重要阶段。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坚固的文化体系的国度来说，洋务运动对西方打开一个窗口是不容易的。它是在民族和国家遭受危亡压力之后，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较为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的行为。这样的转变是艰难的，它在一片围剿声中坚持下来，给国人对自身精神文化的反思铺垫了道路。当然，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漫长的，也是痛苦的。中国是一个以经典立国的国度，中国文化也是以经典精神作为其文化的核心。中国人历来以为，能够据守本土的精神家园，就能以不变应万变，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先例。然而，在郭嵩焘、马建中等一批知识分子深入西方，并具体地接触西方时，才知道了西方并不只是以经济器物见长，它的优势和力量是存在于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整套体系之中。郭嵩焘从自己的见闻中反复强调：西洋立国，是以国家大政为本的，其精神有利于国家实力的发展。^① 关于这一点，西方传教士也曾经提出过。不过，长期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很难改变的，西方文化的进入也必然遇到极大的阻力。东西方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便具有生存竞争的意义。

^①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36—144页。

尽管中国文化优势论者可以举出许多国粹与西方文化抗衡，然而，在现实的打击面前，人们仍然有理由对它的存在意义提出质疑，它能不能使这个民族的生存得到最起码的保证。正如鲁迅说的：“我有一位朋友说的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力量，不管它是否国粹。’”^①这种具有功利性的文化选择标准，确实也是当时的形势所逼迫的，以此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功能，有其合理的方面。中国文化的现实价值确实要以其能否保护本民族的利益来衡量。

基本的生存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关注的焦点，由生存危机导致的种种冲突，进一步考验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基础在现代社会存在的可靠性。由现实直接的生存利益触发出来的问题，可以反映出现实的价值的利益，更可以反映出它的内在的文化关系。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渗透，渐渐地引起了中国国民的文化价值观的变化。文化的变异，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关注和焦虑。康有为在1889年1月上清帝的《乞赐面对折》中，不无焦虑的陈诉，“今深目高鼻之夷，交错内地，藩属尽削，腹心渐披，上下忧愁，无所为计，何其痛也。臣每念此，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仰屋辍箸，涕泗滂沱，不知忧之从何来也。”^②

在当时，一个对社会尚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或者一般国民，都会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境况产生悲痛的情感。同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往往能够对他的时代和对他赖以生存的文化有着强烈的关注，并具有强烈的省察的穿透力。这个时期的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往往把这个时期的民族生存感受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个时期的一些敏锐的作家，如鲁迅等人，能够把他的民族在一个激烈的变革时期的心态历程总结出来，并把他艺术化地展现于文学作品之中；同时，他们还以自己强烈的责任感向社会提出了自己的理想，把国民堕落的精神改造过来，以拯救陷入危亡

^① 鲁迅：《热风·三十五》。

^② 《乞赐面对折》，汤志钩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页。

的民族和文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它的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王权观念和王权机制，这样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它同时也完成了这次社会革命的任务。它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这个时期在政体形式和文化观念上的多样化的尝试，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在观念上，它对王权的威信进行了一次革命性的打击。以后的几次复辟，如洪宪帝制、张勋复辟都十分短命，便可见到传统专制王权是较难立足的。当时梁启超就说过：“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① 推翻一个专制王朝不容易，要消除由上千年的王权文化所形成的心理定势更是难上加难。专制主义及其体制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上演，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评价辛亥革命，如果只是简单地认为它的革命的不彻底性，而没有看到它所面临的强大的文化力量的对抗，就很难对它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作出准确的评价，也很难对中国文化和进入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有更深的认识。即使在今天经历了时势的更迭变化，中国文化的根性仍然是那么根深蒂固，要求辛亥革命对社会政治文化彻底的变革，那是苛求，也是不实际的。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性的一步，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符号，这个符号永远标记在中国的历史上。

20世纪初是一个社会文化选择的时期，也是一次机会：传统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科学的、民主的、玄学的……各种思想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在历史转折的舞台上竞相亮相，并展开了空前的较量。一些文化思潮在历史的过程中突显出来，而另一些思潮在现代历史的长河中淹没消失，这些都是历史的选择。例如，当年的国粹主义，就是相当一部分人对生存依据的一种选择。“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

^①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6页。

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①

国粹论者把中国发展的方向定位于对传统文化的确认和发展上，这些人不一定是在反对社会的发展，他们也从自己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出发，为这个民族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寻求精神的支柱。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认为其中的许多选择是落后的，倒退的，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甚至是可笑的，但是，当时的人们一般还是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现实和未来。例如当时风靡一时的孔教会、灵学会，就吸引了许多人。康有为就认为，孔子之教是“中国之国魂”，中国的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如果废弃孔教，“则举国四万万之人，彷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怅怅惘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惘惶惑，不知所往也。”^② 这样的选择，包含着由上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对民族文化的依恋和认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王权的显性的统治，但并不意味着断绝了中国的文化长河，要做到这一点是根本不可能的。汹涌的历史文化的河流仍然裹挟着它的民族走向未来。实际上，辛亥革命作为结束传统王朝的标志，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这之后的历史发展，是应该由其后来者去选择和建设的。

辛亥革命后的纷乱的社会以及纷乱的精神信念，反映了由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非连续性。这是一个传统核心价值瓦解的阶段，也是一个精神权威真空的时期，各种思潮各种理想纷纷登场，并力图在纷乱的现实中投入实验，以影响历史的进程。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的种种理想许诺并未都得到兑现，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对革命的失望。1922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概括了当时人们的某种相当普遍的心态：“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渐渐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③ 这的确是一种社会心态，它是现实发展中的一个方面。在

^① 许守微：《论国粹无碍于欧化》，《辛亥革命前10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2页。

^② 康有为：《复教育部书》、《不忍》第4期。

^③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5页。